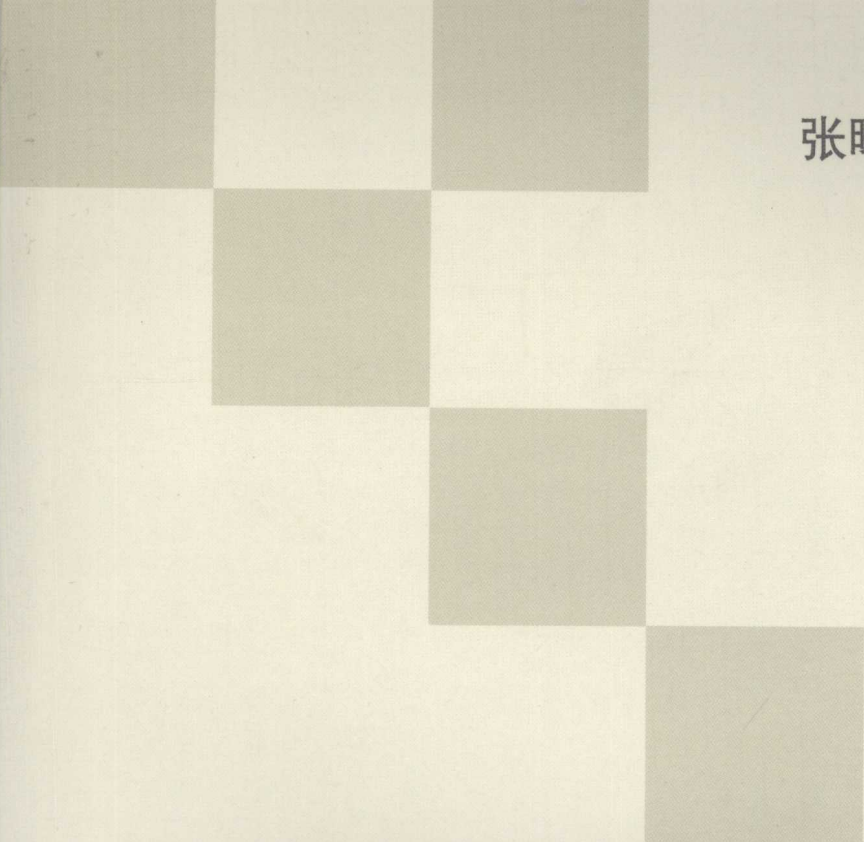




张曙光 著

# 论历史观及 社会发展模式

---

LUN LISHIGUAN JI SHEHUI FAZHAN MOSHI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论历史观及 社会发展模式

---

LUN LISHIGUAN JI SHEHUI FAZHAN MOSHI

---

张曙光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历史观及社会发展模式/张曙光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206-05502-7

I. 论… II. 张… III. ①史学—研究—古希腊 ②社会发展—研究—古希腊 IV. K095.45 D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096 号

## 论历史观及社会发展模式

---

著 者:张曙光

责任编辑:隋 军

封面设计:马继东

咨询电话:0431-85378017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502-7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摘 要

本书通过对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观及其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过程的考察，论证了历史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方法论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盛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进化模式进行反思，运用理论分析和功能测定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和现实性，同时也表明了建立多元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书试图在科学趋于一体化的现代水平上，建构系统历史观和新的关于社会形态的进化模式。其主旨在于：揭示社会系统的发展机制；宏扬主体性价值观；倡导多元思维方式；强调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原则和优化原则；主张通过信息流通机制的完善来促进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变革和人格的转型，自觉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就现实意义而言，在当前思想困惑和信念混乱的社会状况下，本文将为人们理解以往历史和把握现实，提供一个具有整合功能的新的解释模式或认知框架。

## 为学难得出新意

### ——为《论历史观及社会发展模式》序

读了张曙光博士的《论历史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一书（原文名为“系统历史观及社会发展模式”），颇生感触。该书在对古希腊至当代历史观研究的系统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历史观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独立见解，很有启发性。

唯物史观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大重要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的标志。长期以来，唯物史观不仅被看成是一种哲学，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信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反思、再认识从未间断过，哲学家们在不停地探索，他们之间的争论不时擦出火花，从而使充满思辨气味的哲学殿堂掀起波澜。

作者认为，“此文所涉及的是一个重大而严峻的课题：对于以往盛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进化模式，即关于人类历史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形态的模式，对作为该模式的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进行反思，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历史观和社会进化模式。”

由此，产生了如何评价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应当承认，1991年苏联东欧的剧变，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败，而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于1988年，这足以体现了作者的敏锐性和预见性。理论研究不应该都是事后的逻辑体系演绎与事后的经验归纳总结，应该跑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去预测历史的发展趋势，启发人们从沉睡中猛醒，去做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但是，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制度的转变，只能说明苏联模式

的传统社会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还在继续，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已经终结。问题在于，站在当今时代，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是苏联模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还是其理论形成之时就已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否已经到了必须以某种其他更加完善的理论替代的程度？

作者试图运用系统的方法去解决上述问题。并提出了“系统历史观”以及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为标准的社会历史形态模式。八十年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时间成为最新流行术语与研究方法。此书的题目与内容映射出那个年代的鲜明烙印。作者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系统论相结合，提出了系统历史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他提醒我们去认真思考，系统论与唯物史观之间是什么关系？系统论可否替代唯物史观？系统论可否与唯物史观兼容？系统论的引入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有何作用？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系统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从事物内在的统一性出发，注重整体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强调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与开放性，与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并不矛盾。辩证法与系统论的区别在于，其一，系统论重视系统内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动态平衡，辩证法则强调对立统一两个方面，认为事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既相互统一，又相互斗争。其二，作为思维方法，系统论是一种可以相对量化的研究方法，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辩证法则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智慧而非知识。因此，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与运用辩证法研究社会历史，由此形成的理论，也会产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结果。

对作者的理论勇气与追求学术创新的精神，我很钦佩与赞赏。但在具体观点上，我认为作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一切理

论都有其时代背景，任何思想家都生活在特定历史时代。因此，任何思想体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同时也应承认，一些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检验，体现了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和基本价值观的认识，也都有其历史超越性。例如孔子的思想，即使其农业社会的烙印是不言而喻的，但时至今日，其中许多思想言论仍然给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以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萨特说过，只要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又如，关于系统历史观的三个原则，整体性来自系统论，人本主义来自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发展机制也明显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影响。这些原则与其他历史观相比，有何明显的改变和进展，作者拟应深入探讨。

再如，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本来就是多样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他提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同时，他也使用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这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同样，也可以使用系统形态的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的划分方法。麦克利什说过，“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的答案，只是该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却不知道”。各种划分方法都有其特殊角度，都是从社会的某一特征入手，问题是在于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依据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对社会形态的划分目的在于提示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发展规律，以及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我认为，张曙光博士提出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更多地是注重了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两者的区别不是替代性的，而是分析角度、方法与侧重点的不同。

作为序言，不可能概述所有问题，而问题总是很多的。作者在书中开篇阐述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与理论现状不相适应的矛盾。

这或许就是作者甘冒艰险、大胆探索的初衷。而今回眸，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我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就证明，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正是大胆突破了这一局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的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屹立不倒。中国的实践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摆在今天中国理论界面前的历史任务。

曙光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同窗，我们当年同拜高清海教授为师。当年的曙光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善辩好争。当年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曙光师兄与肖前、高清海等学界泰斗的激烈争辩，特别是他那江苏口音加上连珠炮似的语速，于今言犹在耳。就在二十年前，肖前先生和高清海先生对曙光的博士论文，提出了我今天提到的问题。二十年岁月流逝，肖高二师均已作古，于今思来，感慨万千。

作为师弟，本无资格为师兄的博士论文作序，然师兄盛情难却，只好草书己见，供读者参考。

郅 正

2008年3月20日

## 前 言

### 一

本书是我在 1988 年完成的哲学博士论文，原名为“系统历史观及其社会发展模式概论”。此次出版时，除了名称改变以更适合书名和个别的文字校正以外，文中的章节、内容、叙述等，均无任何变动。因为在我看来，尽管理论性的学术著作具有超越性，但无论如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状况的折射镜和记忆载体，同时也会反映该学术著作在当时所达及的理论水平。所以，如果文中运用的某些术语、资料，与当下的语境不太契合，相信读者也能给予正确的解读。

### 二

当初撰写哲学博士论文时，正值改革开放近 10 年的光景。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甚至还是在本科学习时期，我就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持有想法。一方面，我认为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思想的一种不成功的变形，其深层原因只能是

植根于各国的长时段文化渊源和当时国际关系背景之中，其结果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上的重大挫折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落后境况。这导致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思想的重新解读，我的10万字硕士论文的课题就是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以为，即使是达到了对原著的比较正确的解读，以往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原则奉为圭臬，不容任何质疑和超越的做法也是不妥的，因为长期的研究结果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它既不足以充分说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因而也不足以，甚至是不可能完全正确地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了解它的具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和合理因素，同时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以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绝对化，其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不破除这种僵化的、一元化的极端思想原则，创新与发展就无从谈起。这正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的大讨论，以求达到解放思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二，当时约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引起了生产、交换方式和管理体制，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巨变，中国必然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过程的总体趋势，以及开放过程中大量新信息的涌入，极大地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能包容和解释的范围，理论落后于实践发展并制约实践发展的情况相当严峻，后果自然也相当严重，其首先表现为全社会思想上的混乱、信念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实际上，当时我已经较为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而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框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就可能引致社会的质疑并导致社会混乱，甚至是崩溃。而要想突破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框架，首先必须解决社会发展的观念问题，即必须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五种

形态社会发展模式。只有这一传统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一元模式，及其派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方式被突破了，才可能真正达到思想上的全面解放。

在我看来，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共性的，即：不顾具体条件全力推行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尤其是公有制原则；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专制及其对全社会思想创新能力的扼杀。而这些又都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在一般方法论上的三个局限性有关：一是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局限于用经济形态表征整个社会形态，缺乏对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政治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技术性研究；二是在发展逻辑上局限于因果线性关系；三是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过分强调历史决定论。

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基本功能的丧失不仅表现在社会主流认识和改革开放实践两个层面，而且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因此，无论是否下决心割舍传统发展模式，都有必要鼓励创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利于为人们提供多种价值理论参考系统，推进思想解放。

其三，我以为，建立在将技术性的分析和人本主义主体性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新概念和新方法论去解读历史和描绘社会发展轨迹，已经有可能使自己在关于社会发展观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实际上，只要撇开意识形态的桎梏，承认并允许建构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性，侧重从技术性的功能测定的评价尺度去衡量，我们后人完全可以构建出更具合理性，更具解释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因而也更具整合功能的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运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更清晰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从而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把握自身的命运。

在我看来，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也不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充分的描述，充其量不过是说明了以往可证实的历史和根据现有材料及人自身能力可以预测的不远的将

来。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种材料足以使我们领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条合理的轨道，这条轨道又只能在社会历史趋于进化的过程中被铺设起来，而人类以往的可知历史和今天所能比较准确展望的未来所表明的，恰恰是铺设这条轨道的完整过程。所以，我所设定的社会发展模式旨在展现铺设这条社会发展轨道的基本轨迹及其主要阶段，亦即社会发展机制得以完善的不同阶段。而这也意味着，以人类主体形态的形成和多元化开放阶段为基本依据的社会形态，并不见得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而毋宁说是社会达到了新的发展起点，即通过合理轨道的建成而使社会自身能够真正不断健康发展的新起点。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以新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方法论，可以导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贯彻的整体性原则，即现代化的完整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因此必须通过对各个子系统的统一而有序的改革才可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完整目标。中国近代化的不成功和现代化之初一些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不能充分认识到社会各子系统功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试图只追求经济改革而极力回避政治体系的分化及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转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企图在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同时，维护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进而维护集权政治体制，其结果只能是发展的停滞及增加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付出。

二是要想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坚持贯彻社会系统发展的优化原则，即：通过文化子系统和人格子系统内的信息流量的不断增长，把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的损失减至最低程度，争取以较低的代价和成本赢取发展目标的实现。在这当中，对信息量增长之初表现出来的分化过渡的现象不应过多的忧虑和惊慌，因为在信息流通机制较为完善的条件下，社会可以通过自组织

性达成更高水平的整合力量，促进分化和整合相互适应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维持分化和整合的统一。其实际的效能在于，由于问题首先在信息流过程中被提出来并引起了重视、讨论和形成解决方案，使得有可能在实践上少犯错误并减少实质性的损失。就社会的个人层面来说，一个人的知识越多，价值参照系越多，行为的合理性、有效性就越强；就社会的集团层面来说，信息流量越大，决策及其行动选择的合理性就越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特定时期建构某种模式或提出某些口号以求加强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或许是必要的，但切忌通过对大众传播工具的严格控制使其过于强化和绝对化。

正是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原则和优化原则出发，我在文中提出了自觉走向现代化的命题，其核心意义在于：自觉地把人的现代化及现代人的培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把观念的变革作为培养现代人的基本手段之一，努力通过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个子系统的改革，加速现代化进程。与此相应，文中提出了思想观念变革的十大主题，而这十大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

### 三

就在本文完成不久，亦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惊天裂变：老大哥苏联于一夜间宣告解体，苏共在全民直选中丧失执政地位成为在野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全面崩溃，其中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企图对社会变革进行武装镇压，反倒被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并被乱枪处死。

我国当时也发生了重大社会风波，但最终却能够处惊不变，虽然有其特殊国情和文化渊源，但根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是中国共

产党自身吸取了历史教训，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目标，而且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人民在收获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同时，当然也就收获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发表了1992年南巡讲话后，在其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迄2007年底，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四。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经济腾飞的奇迹，在理论上确实有太多需要总结的东西。在我看来，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不但奠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政治价值目标，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政治思维方式，即不进行所谓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方式和实践指导原则，而发展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强调的这种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坚持发展第一的原则，看似简单，但实质上却是以四两拨千斤之巧力，达到了思想解放和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极高境界。正是在这种政治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不但通过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思想磨擦而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增强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长期保持了社会动员的能力。与此同时，经历了一定的思想冲突和社会风波以后，全党、全国上下所达成的共识是：改革开放需要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状态，因而应当是在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得全党、全国上下求同存异，齐心协力，集中一切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开展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二，在我国经济体制日益全面市场化并逐步纳入全球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充分体现了务实求真、勇于学习、善于学习的科学态度，从而不仅在科学技术的引进上，而且在市场

运作法治化、规范化，党务活动日趋公开化、程序化和行政管理专业化、技术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这些都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综合性的保障。

其三，对大众传媒的发展，尤其是对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和拥有手机的人数均已名列世界前两位。信息技术的发达和广泛应用，客观上保证了信息量的持续扩张，加上党和政府对公共领域及其信息传播、交流所持有的包容态度，使社会系统发展的优化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而使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个性产生了巨大变化，有效地推进了文化和人格的现代化转型。

其四，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上，已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承诺，而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在实践上保持了一个不断增量的持续发展过程。例如，在农村实行村干部直选；在新型住宅社区推行经业主普选产生的业主委员会管理制度；在党内逐步实行差额选举；批准香港在2017年实行特首直选；允许媒体对台湾的近两届大选进行真实、全面的报道；等等。

或许理论工作者都具有同样的特点，即偏好用自己提出或认同的理论模式与思想原则去衡量和评价相关历史和事件。二十年前，我在本书中提出并论证了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并由该模式出发定性当时的中国属于一元化开放阶段。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开放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在经济子系统方面尤其明显，甚至可以说已初步具备了科技信息——服务型商品经济的基本构架：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信息传播已日益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稳步上升。但即使如此，我个人认为，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处于一元化开放社会阶段。这一结论主要立足于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一是目前我国在体制的现代化转型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只具有结构性意义，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原则所要求的具有系统性意义的体制转型还将经历很长时间，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任

重而道远；二是迄目前为止，鼓励和支撑社会具有创新和发展动力的信息流通和传播的良好运行，说到底仍是由党政领导人的人格的包容性及现行的开放、宽容政策进行调控的，并没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因而我们还不能完全界定当下我国社会已形成了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思想创新的运行机制。世界文明史和中国文明史都清晰地昭示了下述定律：当一个社会非人格化的法律权威还不具有至高无上性，与此相关，个人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创新能力并不能通过法律形式获得充分保障时，这个社会就必定深藏着导致文明僵化，发展停滞，甚至重新走向倒退的悲剧基因。所以，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只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去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实际上已脱离学术研究并下海从商，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精神和学术情节却始终挥之不去。我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些问题：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开始，民主、科学的口号就已得到了中国全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无不以推翻封建帝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己任。但为什么经历了近百年历史沧桑，政治体制的集权性质，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甚至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的推行无疑需要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旦发生民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就极易引致过度现象，其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反而对改革和开放起到了阻碍作用？

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需要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这导致我在2000年又重新回到吉林大学去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就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课题而言，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下述三点认识。

一是：现代人类文明已经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社会开放、人权保障、和平发展、交流合

作、尊重科学、环境保护等观念和原则；民主是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的要素之一，它只有在与其它观念、原则的共生共存中才可能真正得到全面、正确的解读和实施。

二是：对目前中国来讲，与民主最具有共生意义的元素是法治。一方面，法治是民主的前提，没有法治，民主完全可能会堕落或畸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和社会动乱，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推上绞刑架和中国文革大民主闹剧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法治又是民主的保障，因为任何未能得到法律保障的民主都是短暂的、虚假的和随时可取缔的。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法治化进程具有同步性，理应携手同行。

三是：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不仅仅是民众政治参与制度，而且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机制，因此民主的实施需要以民众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较高的自组织性为基础，正是这一点规定了我国民主化进程的路径，即必须首先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有意识、有步骤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这样才可能在保持社会高度稳定的同时，最终实现宪政和高端政治权力的分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社会体制的先行变革，政治体制民主化要么就是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标榜和承诺，要么就会在实践上导致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过度，极易造成社会混乱状态。

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体系能够真正得到认同和确立，法治化进程加速，社会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并开始实施，这时，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实现也就真正具备了给出时间表的可能。

## 四

尽管小平同志提出的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的做法，对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解除桎梏，减少思想摩擦和推动变革和开放起到特效作用，但经过一段时期的长足发展以后，理论上的真